雍正研究论纲

史　松

(一)

雍正一朝时间不长，地位重要，它在清前期以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起了重要作用。清前期的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兴盛时期，为时达百年之久。雍正在康乾两朝之间，承先启后，继往创新，匡失纠偏，没有雍正一朝的业绩，就谈不到“康乾盛世”。“康乾盛世”其实该是“康雍乾盛世”。

雍正朝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同雍正帝分不开。雍正帝继承了康熙帝的未竟之业，克服了康熙后期的危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乾隆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康熙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功业，使我们现代中国人仍然身受其惠。但康熙晚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都在激化，形势十分严竣。由于天灾人祸和吏治腐败，各地闹事、民变、起义此伏彼起。准噶尔蒙古上层分裂国家的活动仍然猖獗，波及青海、西藏。北方沙俄虽相对安静，但其扩张野心从未止息，时时伺机南侵东进。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即诸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直接威胁到皇朝的命运。这一斗争持续二十余年，危及国家的政治稳定，影响到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后果。雍正帝即位后，从恢复皇权集中统一入手，实现了政治稳定，然后着手政治经济改革，不仅继续康熙未竟之业，还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雍正帝虽有其缺失和局限，仍不愧是颇有作为的君主。

雍正时期世界已经进入十八世纪，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资本主义方兴未艾，西方各国凭借先进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的经济实力，用血与火的野蛮手段向全世界殖民扩张。一片片土地被鲸吞，一个个民族被奴役，侵略锋芒已经指向中华大好河山。如果康熙后期中国的动荡局面不能扭转，甚至更加恶化，动乱不已，四分五裂，在强敌面前，中国各族人民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雍正帝使中国恢复了稳定，继续作为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使西方侵略势力在一百多年里不敢轻侮。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虽然，道光以后，中国因为政治腐政、经济落后，终于无力低挡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不能仅由某些个人负责的。

许多年来，雍正朝的地位和作用常被忽视，对雍正帝也肯定不够，这是不公正的。一位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却长期被否定、被鞭笞，实为罕见。从当时到现代，各种流言蜚语，通过野史传奇，对雍正帝大加挞伐。究其根源，起因于雍正帝继位，因为他在皇位继承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二)

否定雍正，首先是说他“得位不正”，是“篡夺”。考诸史实，“篡位”之说莫须有，而夺嫡则是事实。康熙帝的嫡子是很早被立为皇太子的皇二子允礽。其他诸皇子成年封爵后，各立朋党，纵横捭阖，既联合以对付皇太子党，又互相争斗。二十余年的惊涛骇浪，皇太子一废再废，呼声很高的皇八子允祀、皇十四子允禵先后失败。康熙帝于临终时传位雍正。皇四子雍亲王胤禛是夺嫡斗争的胜利者。

雍正帝嗣统并非篡夺，证据甚多，不再赘述。须知，康熙帝乃是英主，对其诸子知之极深；晚年虽然多病，但直到临终，神志一直清醒。他直到最后时刻才宣布胤禛为皇太子，实为深谋远虑，有其不得已之苦衷。鉴于允礽的惨痛教训，过早宣布皇太子，将使其成为众矢之的，被倾陷的对象。虽曰爱之，其实害之。所以，在康熙帝晚年，一方面向希望皇权稳定早立皇太子的朝臣一再保证，他不会不重视社稷大事，必选可靠之人继位，令大家放心。另方面又采取措施，使他选定之人能安全即位。派允禵西征就是措施之一；留隆科多于身过侍疾，朝夕与共，更是关键一着。允禵久为皇八子允祀之党，向来胆大妄为，“胡涂急暴”，遣往远地，明为重用，实同放逐。隆科多乃佟氏贵戚重臣，手握禁军，地位显要，佟家诸人如佟国维、鄂伦岱等皆允祀之支持者，早为康熙帝斥责疏远，自是知悉隆重科多与彼等立场不同，将来可为继位之人保驾，所以才留于身边。

揆诸当时情势，康熙帝只能传位胤禛。在康熙五十六年作为预立遗嘱的长篇谕旨中，已指明艰巨任务只能留待继位者。在诸皇子中，长子允禔、二子允礽早已得罪圈禁；三子允祉乃研究数学、音乐之文化人，担任丛书主编，并无治国之才；五子允祺、七子允祐无为君之志，亦非可担大任者；八子允祀多次受责，已公开宣布其决不可能为皇太子；九子允禟、十子允䄉皆无能之辈，唯八阿哥马首是瞻者；十四子允禵与允祀一党，已遣往数千里之外。皇四子胤禛几乎是唯一合适的人选。胤禛既有能力也有实力可担此大任，可以解决康熙遗留的各种困难问题。雍正即位后的实践，证明康熙的选择是正确的。可以说，传位雍正，是康熙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亲自导演的一幕活剧，是他一生中进行的最精彩、最成功的“战斗”之一，在斗争中掌权，在斗争中交权，组成了康熙帝战斗的一生。

雍正帝即位后，总结以往的教训，建立了新的皇位继承制度：“密匣立储”。这是雍正的创造，是对历代宗法制度和满洲传统的否定。它加强了皇帝选择接班人的权力，有利于最高统治权的稳定。雍正以后，清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斗争即大为缓和。

(三)

雍正初年的反“朋党”斗争，是雍正帝在皇族中清除政敌以巩固皇权的重要措施。它实际上是康熙朝夺嫡斗争的继续。

这一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就客观情势而言，长达二十余年的斗争，有其惯性，不可能突然停止。康熙帝晚年，因体衰多病及皇子党争，其权威已不如往昔，虽有遗诏，觊觎皇位者宁愿照满洲传统办事，凭实力夺取皇位。雍正帝的政敌主要是皇八子党，它经营已久，人多势众，富有资财，不择手段地为皇权斗争已经成为习惯。除了八阿哥或十四阿哥外，这一集团的成

员不承认别的主子，这已是一种信念，并造成了强大的舆论。社会上又有许多企图攀龙附凤的推波助澜之徒，从中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从当时“政治浮言”之多可见一斑。民间流传着雍正帝“十大罪状”，一直传到偏僻山村(如：湖南郴州永兴县山村秀才曾静处)。

雍正帝面对的是强大的反对派，他别无选择。双方情势，如水火，如敌国，无法调和，非分出胜负生死不可。在封建专制下，皇权“万能”，只要掌握皇权者并非“庸愚下流”，不犯重大的策略错误，就必定可操胜券。雍正帝仅用了三到五年的时间，就战胜了对手，使皇权得到巩固和加强。在策略的运用上，是颇为成功的。

雍正帝的“十大罪状”中有“屠兄杀弟”一条。实际情况是，在雍正帝的兄弟中，被圈禁的有五人(一、二、三、十、十四，其中前二人是康熙时圈禁的)，“非常死亡”的二人(八、九)，属于臣下希旨，并无正式谕旨，虽称“病死”，但雍正帝不能辞其责，所以对杀弟一事，他自称“不辞亦不受”。

雍正帝也用斩杀、流放、圈禁、上九链，抄家等惨酷手段对付政敌，这都是封建国家的刑律和惯例所规定的手段，他的祖宗历来都是用这类手段处置敌人和“罪犯”。何况，当时双方争夺的是皇帝宝座、国家最高权力，同任何这类斗争一样，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在封建社会里，类似的残酷斗争，历朝皆然，史不绝书。在当时情势下，雍正帝若不采用果断的霹雳手段，也确实无法解决问题。“若畏浮言之讥讪而不能果断者，此庸主之所为也”。有利无弊的事情是没有的。做任何事情必须付出代价。就雍正帝所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而论，杀人是少的(如：比明太祖)，代价相对也是小的(如：比西晋皇室)。当然，有时打击面过宽，要求过严过急，事后辩解过多,这是同雍正帝性格分不开的。

(四)

隆科多、年羹尧两案是雍正朝的重大政治事件，一直引人注目。这两案既相同又不相同。相同的是，二人都是雍正帝的功臣，又都不得善终。不同的是，二人地位不同，所起作用不同，“罪状”不同，结局也不完全相同。

“怀疑诛忠”是雍正帝的又一“罪状”。“狡兔死，走狗烹”成为古今同叹。人们总是同情不幸者。

同情往往会对二人的功罪判断不准确。对二人之功绩常常夸大，对朝廷所宣布二人之罪状又不愿相信。对隆科多，长期流传着“篡改遗诏说”，似乎若不是他私改遗诏，雍正帝不可能得到皇位继承权。其实，此说起源于允祀集团，纯属莫须有。隆科多的功劳，主要是因其手握禁军，又久在康熙身边，在皇权过渡时期、对维持安定，保卫雍正帝顺利登基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他才自比白帝城之诸葛亮。年大将军的故事更是一直脍炙人口，演义传奇颇多。说他于康熙朝任总督时就统率数十万大军举足轻重，并制约皇子大将军允禵使其无所作为，雍正朝任大将军后军功显赫。这都不符合事实。总督所部不过数千，何能制约大将军王？青海之役立功者是岳钟琪，年羹尧其实是功不抵过。

考察两案不能离开当时政治形势。当雍正即位之初，皇权并不稳固，一些人不相信雍正的皇位已不可动摇，产生惶惑，并不足奇；某些有权势的野心家心生觊觎，也是势所难免。但是，隆科多、年羹尧作为朝廷重臣、亲信中的亲信、雍正皇权的主要支柱，在严重的斗争和动荡的局势面前，却有怀挟私心、不忠不敬的表现，甚至有首鼠两端之嫌，这当然为雍正帝所不

能容忍。

隆科多之得罪，从雍正帝宣布的罪状中可以看出，当雍正帝大力肃清政敌时，隆科多大概是接受请托太多，或者并有兔死狐悲之感，所以奏请保全者多，有时甚至将敌对集团的成员收归自己门下，以致雍正帝怀疑他别有用心。隆科多自比诸葛，有意触犯忌讳，也有深意。他当然知道，雍正帝乃极自负、自尊心极强之人，岂能被喻为阿斗；又岂能容忍一位“相父”。故意宣扬，意在挟制。当所谓“私藏玉牒”事发，隆科多就终于难以幸免。

年羹尧并无取代雍正的野心，说他能称王称帝，不过是星相家阿谀之词。但是，面对复杂形势，企图乱中取利，浑水摸鱼，借势营私，弄权肥已，或者坐山观虎斗，拥兵以自重，即使朝廷分裂，天下大乱，亦可割据称雄，这些都不能说毫无根据。雍正帝也知道年羹尧志在观望，所以当年羹尧于雍正二年冬入觐时，没有听从留年羹尧于京师以防其生变的劝谏。处置年羹尧两年以后，雍正帝回顾当时情势，说是深知其无能，不肯轻举，若恐其妄动，难以箝制，必不会纵之远去。“盖年羹尧之不叛，非不为也，实有所不能也；朕之不提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

在雍正帝看来，处置隆科多、年羹尧，乃其“自招”，是他们“倚功造过”的结果。当然，如果雍正帝宽厚一些，以功抵罪，二人亦可以不死。夺其权，置之闲散，杯酒释兵权，也未尝不可。但猜忌心强又极重“颜面”的雍正帝做不到。亲信重臣问题暴露，使雍正帝怒、恨、愧、悔交织，最后，一人令其自尽，一人病死于禁中，基本上没有株连，算是留有余地。

（五）

为了同政敌作斗争，为了治理国家，雍正帝都需要可靠而得力的班子。他从贝勒到亲王已二十余年，分藩开府，自有一套人马，但从即位以后的情况看，“藩邸旧人”并不多，见诸史籍的不过一二十人，雍正即位时任督抚者唯年羹尧一人，其余任职最高者不过道员。雍亲王的实力不如允祀、允禵等远甚。满朝勋贵、文武大臣从前曾一致拥护过八阿哥，以后大都揣测十四阿哥当立，除个别人以后已取得雍正谅解外，皆非可以依赖者。这一情况，增加了迅速组织班子的迫切性。

雍正帝首先在皇室中组成自己的拥护层，在众兄弟中形成多数。皇十三弟允祥一直是四阿哥的崇拜者和支持者，雍正初年，晋为怡亲王的允祥起了重要作用，是雍正帝最可靠的臂膀。由允祥推荐，皇十五弟允禄、皇十七弟允礼相继被晋爵重用。雍正帝又善待五、七、十二诸皇弟，爱养二十至二十四诸幼弟。这样，在诸兄弟中，允祀等四人成了少数，皇三兄允祉被孤立。

根据亲自观察了解，迅速破格起用，是雍正帝用人的一大特点。这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在这些文武大臣中，如：办事缜密、博闻强记的张廷玉，耿介忠直、廉勤皆备的鄂尔泰，勇于任事、不畏讥谗的田文镜、李卫，忠于职守、任劳任怨的嵇曾筠，文武兼资、勇敢善战的岳钟琪，等等，皆各有所长。雍正朝有一大批能员。雍正朝的政绩是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雍正帝的用人标准，忠廉勤三字可以概括。忠，当然是前提条件，必诚必敬，毋隐毋欺，鉴于当时政治情势，雍正帝对此特别重视。他经常强调的是勤，勤，就要实心实政，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权贵。他讨厌空谈，反对无所事事，斥责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员是“木偶人”。虽然提倡清廉，但对以清官为标榜无所作为者极为反感，称之为“巧宦”，说他们

比贪官还坏，因为贪官声名狼藉而“巧宦”常有美誉。

从当时的形势需要和用人标准，雍正帝用人常不拘一格。科目出身和非科目出身者同样被重视。因科目出身者常多“巧宦”，又好结朋党，所以雍正帝宁愿重用非科目出身者。

对符合标准的人员，雍正帝亦不拘其小节。对选定器重之员，还能原其小过。如：李卫嗜酒爱看戏；田文镜用人失误；鄂尔泰搞改土归流过急，又用人不当，致西南民族骚动，虽都受到检举参劾，雍正帝皆不予追究，甚至亲自为其辩解。这也颇难能可贵。

（六）

整顿吏治、提高官僚机构效率，是雍正朝政绩的重要方面。

康熙后期的弊端之一就是吏治腐败，大小官员忙于搜括民财，“奇贪极劣”者比比皆是；少数以清廉著称者亦不理政事，不问民之疾苦，人祸天灾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雍正帝即位不久，即大力整顿吏治，一面起用廉勤能干之员，一面打击贪官污吏。在惩贪时，坚决勒令退赔，广泛使用监追、抄家等手段，不使贪污者在经济上占到便宜，即使本人被处死，也不许其子孙“安享”赃私。尽管受到“爱抄人家”的讥讪，雍正帝也不动摇。这种做法，好处甚多，值得称道。

整顿吏治同整顿财政是结合进行的。为了审查重要支出项目，建立了会考府，由怡亲王允祥主持。为了清查各省钱粮亏空，派出人员往江南财赋之区。这一着抓住了关键。通过分清“官侵、吏蚀、民欠”，既整理了财政，增加了国家收入；又使贪官污吏无所逃遁；还通过调职调省清查，锻炼了一批府州县官员，可谓一举数得。

提高官僚机构效率，一是抓人才，二是抓机构。抓人才是为了加强现有机构，现有机构不能得心应手，则增设新机构。雍正朝新增机构和新设官职颇多，如：为加强财政监督，设会考府；为督促农业生产，设巡农御史；为更好治河修水利，分设三河督；为加强教化，在数省设观风整俗使；为使地方权力集中于亲信大臣，设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河东总督；为迅速有效处置军国大事，设军机处；为提高八旗办事效率，设副参领、副佐领，等等。有些机构旋设旋裁，唯军机处保留下来，其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可以看出，雍正帝用人设官，不拘成法，因时因事因人因地制宜，需要即设，不需要即裁，运用自如。有些作法是很奇特的。他打乱常规，命浙督李卫兼管江南治安；命四川督抚于民族、军务事项就近请示三省总督鄂尔泰。鄂尔泰还只是云南巡抚时，命其以巡抚管总督事，而该总督却以总督管巡抚事。鄂尔泰升任大学士，在京供职，命云贵广西三省督抚于地方紧要事务照样“知会”、“禀报”。

密折制度不是雍正帝的发明，但却是他普遍推行于一定职务的官员，成为不成文的重要制度。雍正朝准许密折奏事的官员从康熙时期的一百余人扩大到一千三百余人。这项制度，对于皇帝了解下情、监督官员、提高官僚机构效率，都是有益的。

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雍正帝给运转不灵、死气沉沉、日趋腐朽的官僚机构注入了一些活力，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得到加强。这样，一方面强化了对人民群众的封建压迫；另方面也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有利于各项改革的推行和封建经济的缓慢发展。

（七）

雍正帝所推行的各项改革，表现了他的远见和魄力。如：开豁贱籍、摊丁入亩、改土归流，都是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对于解放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重要意义，实为善政。改土归流还有加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意义。

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设养廉银是雍正改革的两个重要项目，前者是税制改革，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后者是薪俸制度改革，使地方官员额外收入合法化，可以维持正常开支，有利于惩治贪污，使“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推行这两项改革时，都有不少反对意见，个别地方因反对摊丁有聚众闹事者，雍正帝审时度势，毅然推行，应该肯定。

同康熙帝一样，雍正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除继续奖励开垦、兴修水利、治理黄淮运河之外，还推行了清丈田地、岁奖老农、修治海塘等项措施，也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雍正经济政策有较大局限，表现在发展农业生产的片面性，和对工、矿、商各业的多方限制。究其原因，除传统的重农抑商外，主要是害怕危及封建统治。开矿或其他手工业使“民聚众多”、“良莠不齐”、“易于生事”；经商者甚至江湖医生等以其四处流动，难于防范，都在严查之列。在雍正朝，聚众开矿常被朝廷视为“矿匪”，派兵驱赶剿除。对某些种植业（如与粮争地的果木业、菸草业）、某些畜牧业（如与人争粮的养猪业），雍正帝亦三令五申，极力反对。这些错误政策，严重地阻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雍正帝经济政策的局限性，同他对自然科学的无知有一定关系。他和康熙不同。康熙帝聪敏好学，加之西洋传教士的影响，举凡天文地理、三角几何、水利测量、枪炮火器，都颇为精通；对治病养生、种植育种也有研究。康熙帝的自然科学知识，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运用这些知识于治河、农耕、军事，都取得效果。遗憾的是未能广为传播。雍正帝的“业余兴趣”在宗教，对佛、道、喇嘛、天主教的经典都有一定研究。政务之暇，他常津津有味地同近臣研讨佛经要义，一群“居士”参禅论道，“开明释法”、“透三关之理”，同康熙帝孜孜于自然科学，大异其趣。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这种缺陷，必然对整个国家、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整个国民经济停滞不前。雍正时期人口增长的压力已经露头，“户口日增，生齿益繁，而各省之内，地不加广”。中原地区的荒地开垦已近极限。地方官为求升迁，每年于申报开垦时常以河滩沙砾之区充数，升科钱粮飞洒于现在地亩，“名为开荒，实则加赋”。不重视科技，又使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无法提高。在这个难以解决的矛盾面前，雍正帝除一再号召多开垦、节约用粮之外，别无良策。

（八）

雍正朝的军事活动，主要是对准噶尔。解决准噶尔问题，是康熙的未竟之业。同康熙帝一样，雍正帝对准噶尔蒙古首领分裂侵扰活动的危害性，有足够认识。准噶尔不能“平定”，则青海、西藏、喀尔喀蒙古以至内蒙古都将受到威协，国家绝大部分陆地边疆将永无宁日。所以，雍正帝多次申明：对准噶尔用兵，目的是制止其分裂侵扰活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宁，并非利其土地、人民。

雍正帝作了七年准备才开始行动，一是需待国内政局稳定，二是在选将练兵、军需后勤

方面预作筹画。这同康熙帝战前必认真准备的作风相同。几年间，雍正帝筹措的军需用银达六千万两，相当于每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两倍，为此而建立了专门的机构一军需房，即军机处的前身。军事行动的导火线是准部支持青海蒙古部落叛乱，又收容叛乱头目罗卜藏丹津。雍正七年正式出师，分西、北两路，北路以傅尔丹为帅，八旗兵为主；西路以岳钟琪为帅，绿营兵为主。战事延续数年，打打停停，互有胜败，到雍正十二年，双方都难以为继，在准部首领有所表示后，军事行动宣告停止。同出师时之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相比，结束时显得草草，有些虎头蛇尾。

考察此次用兵的全过程，可知雍正帝在军事才能方面不如康熙帝远甚。军事行动刚开始，雍正帝就料敌不足，以为己方兵精粮足，胜券在握，因而故示从容大度，为了期待敌人来降，竟令大军暂缓进攻，顿兵于敌境之外一年之久，以致先机丧失，将士怠忽，师老兵疲。准噶尔兵乘机进攻，小部袭西路作牵制，大部出北路求决战。果然，岳钟琪部受袭扰，马驼尽失，难以出击；傅尔丹轻敌冒进，全军尽覆，仅以身免。若非额驸策凌有光显寺之捷，这一堂而皇之的军事行动将难以收场。任北路大将军者，先是有勇无谋、徒有虚名的傅尔丹；后是无一可取的纨绔子弟马尔赛，北路军之败及以后之一再贻误战机，雍正帝实难辞用人不当之咎。岳钟琪有军事才能，而雍正帝信用不专又好自作聪明，出师后除派出许多无能而好生事的满洲大员监军外，又从数千里外事事遥控指挥，使岳钟琪处处掣肘，无法施展。西路受敌袭扰后，雍正帝从大意轻敌变得过分谨慎。他拒绝相信敌军主力在北路的正确情报；又不肯批准岳钟琪乘虚击敌后方的可行计划，强令两路均消极防御，以致处处被动，踢蹭尴尬，进退两难。最后，并无大错的岳钟琪同败军之将傅尔丹一齐成了替罪羊，下狱议罪。

雍正朝有两次很漂亮的战斗，一是岳钟琪进剿罗卜藏丹津叛军的青海之战，一是策凌大败准噶尔兵的光显寺之战。这两战的共同点是没有雍正帝的干预掣肘，这是获胜的主要原因。当时，统兵将领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机断处置，乘敌不备，不失时机，迅速突击，故能以少胜多。这说明，雍正朝并非没有优秀军事人才，只要能发挥其主动精神，使其才智能以施展，就会创造奇迹。

在西南地区曾有过多次军事行动。其起因大多是在改土归流中官吏贪虐引起少数民族反抗。官兵征剿时，又常因用人不当，以指挥拙劣、极其残酷著称。

（九）

在对外关系方面，雍正帝基本上遵循了康熙时确定的方针，这就是：在北方，同俄罗斯保持平等的睦邻友好关系；在东南沿海，对日本和从海上入侵亚洲的西方各国保持警惕；对来华的西洋天主教士，可以利用其对中国有用的知识，但禁止在中国传教，以防威协国家主权；对朝鲜、安南、琉球等邻国，维持在册封朝贡传统形式下的友好关系。这一方针，虽然缺乏敢于开放、勇于进取的精神，有其消极防御的保守方面，但根据当时中国和世界的情势，是符合实际的。

在顺康雍三朝的近百年间，中外关系主要是中俄关系，它是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事务。这是因为：沙俄侵略势力已深入我疆土，需要使入侵者彻走；划定两国正式边界；建立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此外，准噶尔问题是我国内部的民族问题，需要制止沙俄对准部民族分裂势力的支持。经过政治、军事、外交三个方面的努力，上述任务在康熙朝已大体完成，中俄之间

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平等睦邻关系。但是，还有些问题，如部分边界的划定、经贸关系的制度化、俄国继续暗中支持准部及收容中国逃人等，尚有待解决。在中俄交涉中，雍正帝基本上坚持了维护我国主权和尊严的原则，取得一些成果。但是，由于准部问题的牵制、朝廷的内部矛盾、参与交涉的西洋传教士偏袒俄国，在划定边界时，中国作了较大的让步。在准噶尔问题上，虽然雍正帝对俄国提出了很不妥当的建议和许诺，但俄国仍继续暗中支持准噶尔分裂势力。由于俄国的阻挠，雍正帝三次派往上尔扈特部联络其对付准部的使团，皆无结果。派往俄国的几个友好联络使团亦无成就。雍正帝的对俄外交，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中外历史都表明：外交的成功与否，决定的因素是国力的强弱和内部是否团结。康熙朝的尼布楚条约和雍正朝的布连斯奇条约虽然都是平等条约，但后者在领土等方面作了较大让步。这同当时中国的情势不同有关，康熙时国家强盛，朝廷一致；雍正时则准噶尔问题激化，朝廷内部又存在矛盾。两次的首席缔约代表，都是封爵为一等公的贵戚重臣，但索额图得到康熙帝绝对信任，有强大的警卫部队，以实力作后盾；四十年后的隆科多则不同，雍正帝虽因其熟悉对俄事务不得已而用之，却处处猜忌，拒不采纳其正确意见，甚至为迎合俄国人将其从谈判中撤回。为了避免“刺激”俄方，求得尽快达成协议，雍正帝不许谈判代表携带必要的武装警卫前往边境谈判地点，而俄方则有强大军事力量陈兵边境。缔约后，俄方代表既对大占便宜而沾沾自喜，又继续做用五十个团的兵力即可征服中国的美梦。事实证明：只有自身强大，拥有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内部团结，举国一致，才能在强大对手面前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吃亏。这是国际关系的规律，颠扑不破的真理。

雍正帝将本属中国的疆土一百二十里“赏”与安南国王，是一件中外古今罕有之事。该地系安南于明季混乱时蚕食，云贵广西的地方官力主索回，如安南不服，则以三省兵力征讨。雍正帝不同意这种意见，因准噶尔问题尚未解决，南北同时用兵，国力不逮。因此，在安南国王“恭顺认罪”的前提下，朝廷特派“赏地钦差”携诏宣布“恩赏”。虽然冠冕堂皇，雍正帝确有其不得已处。

严禁中国人出洋、加强对外国来华商船的管理，康雍两朝是一贯的。为预防明朝“倭寇之乱”重演而派人前往日本侦查，则主要出于浙江总督李卫的建议。

禁止西洋天主教士在中国传教，对传教士多方防范，在康熙朝即已开始。雍正时，发现有传教士卷入皇室内部斗争，对其限制更严。大部遣往澳门，候船回国。少数留京者，雍正帝还不时召来，亲自训话“开导”。有些讲话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阐明了中国的宗教政策，颇有见地。

（十）

在思想文化方面，雍正朝的特点是控制加强，文网严密，思想界一潭死水，动辄得罪。

雍正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推广《孝经》，严禁思想异端；在全国宣讲《圣谕广训》、《大义觉迷录》；用政治手段加强对士子的约束，惩治“科举朋党”，文字狱接二连三，知识界人人自危。另方面，除旌奖忠孝节义，设昭忠、贤良等祠外，还在全国各地大建坛庙，崇拜各类神灵，举凡山川湖海、风云雷电，皆受礼拜。又大搞神道设教，宣传天人感应，这成为雍正朝的一大特色。雍正帝多次宣谕：天人感应，捷如影响，不可不信。政治良好，上天示奖，所以有祥瑞；政事不修，官吏不善，上天示警，所以有灾害。因是，各地报祥瑞者纷至沓来，无奇不有，据

《实录》所记，十三年间达五十余起。从日月星云泉，到谷禾芝莲蚕，以及凤凰集、黄河清，都在证明雍正帝的统治“上合天心”。

这种现象有其原因。当时，雍正帝在思想战线上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不仅要重申君权的神圣，还要证明满族入主中原和自己继承皇位的必然性、合理性、合法性。所以需要用神学来补充儒学，调动各类神权来强化皇权和封建专制制度。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倒退现象。

儒学自诞生以来，作为中华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和人际关系的规范，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至今仍有其积极作用。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封建皇权精神支柱。程朱理学作为儒学的后期发展，适应了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它在清朝被尊崇，有其时代的原因。孔子本来不语“怪、力、乱、神”，自天人感应之说起，神学就渗透到儒学。满族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雍正帝面对强大不利于已的舆论力量，特别需要加强皇权的精神支柱，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保守、僵化、复古、倒退，对国家和民族的消极影响却是深远的。

应该指出，在清朝前期，汉族知识分子的动向一直是影响政局的重要问题。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死抱住“辨华夷”的传统观念，“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对满族的统治一直不以为然。虽经顺康两朝“恩养”八十年，到雍正时仍有不少士子希望恢复汉族统治，“反清复明”的暗流始终存在，对朝廷幸灾乐祸，有动乱辄喜形于色，雍正帝谕汉科道官说：“汉人意中每似不愿太平安静者”。这是清朝统治的最大隐患，不能不使最高统治者时时警惕。雍正帝对付的办法是：严加控制，加强镇压；宣传教育，反复开导。一面是霹雳手段，一面是苦口婆心。程朱理学和天人感应说就是雍正帝手中的两件思想武器。结果，在士人中，畏威而不怀德，面谀逢迎者多，正直骨鲠之士少，还形成了经过驯化的文风。

（十一）

思想文化专制的加强，必然要酿成许多文字狱。雍正一朝的文字狱约二十起，比顺康二朝还多。但是，雍正朝文字狱不同于乾隆朝的是，真正因文字贾祸的是少数，多数其实是政治案件，同当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联。如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等案，虽都有“文字因素”，但他们被议罪，首先因为是年羹尧之党，或隆科多之党。雍正帝对投靠其政治对手门下出谋划策、歌功颂德的士人十分痛恨，允祉、允祀、允禟门下的陈梦雷、何焯、秦道然等虽然没有“文字因素”，也一样没有好下场。

著名的吕留良案件，雍正帝也是当作政治案件对待的。该案是曾静、张熙案的延伸。吕留良早已去世，但其著述颇多，受到士人崇信，立祠奉祀，地方督抚以下亦皆尊敬。曾静、张熙受到吕留良“辨华夷”等思想的影响，又被流行的政治谣言所蛊惑，企图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遂成谋反大案。该案发生后，牵连到吕留良之子、孙、门生等多人，许多人不过是受到吕留良之思想影响，完全是无辜的。

雍正帝通过曾静、张熙案，不仅知道当时政治谣言之恶毒（即“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杀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和流传之广；还发现了某些士人反清思想的来源。所谓“辨华夷”的思想，如听其传播，将制造动乱，危及皇朝统治，必须认真对待。雍正帝用了三年时间，一面严缉关连者；一面令全国文武官员、举贡生监就吕案之处理发表

意见，企图统一思想，使舆论一律。为了肃清吕留良思想“流毒”，除命人批驳其著作外，还亲颁多道谕旨对“辨华夷”之说详加驳斥，这就是著名的《大义觉迷录》。雍正帝企图在儒学的范围内找到满族皇帝君临中国的理论根据。他的努力收到一定的效果。

考查雍正朝文字狱，必须看到当时国内社会矛盾情况。有清一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时起时伏。康雍之际，因政治动荡，吏治腐败，讹言四起，民心浮动，一些地方民间闹事、起义接连不断，反清复明活动有复燃之势。但是，同清初不同的是，反清复明的号召已难以吸引广大群众。从雍正七年的甘凤池等密谋反清案中可知：参加者多为工匠、商人、游民，其核心乃信奉“辨华夷”的读书人。他们以星相卜筮作掩护，以“海外真主”作号召，以教习拳棒、按季发饷招揽党徒。雍正帝曾称这类读书人是“好乱乐祸”之徒。事实上，这些人中不少是野心家，企图浑水摸鱼，乱中夺取富贵。曾静就认为“吾儒最会做皇帝”，“明末皇帝该吕子做”。其实，“吾儒”不可能当皇帝，当了也不懂如何治理国家。果真如腐儒曾静所愿，“吕子”当了皇帝，会将中国变成何等模样，给老百姓带来什么，是不难想象的。

但是，雍正帝对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形势估量上并不准确，看得过于严重，以致在处理文字狱一类的案件时，打击面过宽，处理过严。这又常常同雍正帝的性格有关。

（十二）

雍正帝是很有个性的君主，其思想、作风皆有特色。

他于 45 岁时壮年登基，逝世时年仅 58 岁。青少年时因康熙帝对皇子的严格要求，文武兼资，聪明能干。在同众兄弟的明争暗斗中培养了政治经验。少时随父多次南巡北狩，又曾奉命执行某些公务，对下层情况也有所了解。即位后，颇以洞悉下情乃得自亲身经历而自豪，自信不易受人蒙蔽。同康熙帝一样，他勤于政务，生活俭朴，励精图治，夙夜匪懈，所以，能在短短的十三年中做出许多成绩。从他在位期间留下的三万五千余件朱批奏折，以及奏折上朱批的内容，可知其勤奋国事之大概。即位之初，于一日内连发十一道分别训诫各类官员的上谕，说明他确实对各种积弊知之颇深。他虽然标榜“敬天法祖”，但并不拘泥成法，墨守陈规。所以，按照实际情况兴利除弊，大胆推行各项改革，是雍正朝施政的重要特点。雍正帝的政治思想也很值得研究，他对为政之宽严结合、刚柔相济、仁义互相为用等，都有自己的见解，其中确有卓见。他很注意各方信息，重视基层动向，力求掌握第一手材料，据以作出决策，这也应该肯定。

同他的长处、优点一样，他的短处、缺点也十分鲜明。这是他性格上的一大特点。雍正帝精明过人，自视颇高，“朕虽不谓上等圣明之君，亦不为庸愚下流之主”，只是他自谦的说法。他常常过于自信，过于要强，也过于讲究所谓“颜面”。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青年时康熙帝即嘱其“戒急用忍”。对待臣下，察察为明，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缺乏宽容含蓄和豁然大度。处理事情往往太急、太过、太苛、绝对化，不留余地。黑白必须分清，好恶亦必鲜明。爱之常恩宠过分，恨之则立置死地，对“返恩为仇”者更是深痛恶绝。有时好感情用事，对恩宠者推心置腹，不拘形迹，甜言蜜语，大失人君之度；对厌恶者或破口大骂，发誓赌咒，或讽刺挖苦，戏弄调侃，混同市井下流。雍正帝性格上的弱点，影响了他的政绩，有些产生了消极作用，特别是，使敌对势力难于化解，许多流言蜚语更加盛行。

对雍正帝的流言蜚语四处传播且经久不衰，还有雍正帝自身的原因。他在处置其对手时，

总想使舆论一律，又顾虑天下后世可能非议，于是不厌其烦地说明、解释、声辩，絮絮叨叨，再三再四。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他做的一件最大蠢事，就是在《大义觉迷录》中对强加于他的十大“罪状”，逐条详细辩解，还令全国士子每月朗读，所谓“谤毁君父之言，每于月吉宣之于口”，以致“愈描愈黑”，“罪状”反而因之传播极广，深入人心，直至今日。这件蠢事，很能说明雍正帝性格上的弱点。

雍正帝对宗教颇有兴趣，同僧、道、喇嘛、天主教士都有来往。作为“圆明居士”，他对佛经确有研究，《御选语录》、《经海一滴》等著作就是证明。他信风水，讲求“性理之学”，总督高其倬是他的堪舆顾问。雍正八年，他因积劳成疾，除四处求医外，还密谕亲信督抚，访求真仙，召募“异人”。同当时所有满洲贵族一样，又受到某些宗教的熏陶，他很迷信，从神仙、星相，到卜筮、风水，他都相信。这从他根据命相选择西征将领，并亲择出师吉日，就可以得到证明。得知鄂尔泰在云南患病，十分着急，要来八字亲自算过，结论是小病无碍，后有好运，才大为欣慰。田文镜升入上三旗 也是在推算其八字后才作最后决定。江南漕运衙门位置方向不合风水要求，特命高其倬前往指示改建。他生前在堪舆顾问参谋下为自己选定的易县葬地想必也是有其道理在的。

后记：余自 1979 年起研究雍正，曾发表过一些意见，后因参加编写顺、康、雍三朝《清史编年》而中止。在编写《编年》雍正卷时，读朱批奏折约三万件，不时有些想法。兹该卷告竣，初步归纳得十二条，整理如上。许多论点，并未展开。少量引文均见《实录》、《上谕内阁》等官书及朱批奏折，不另加注。